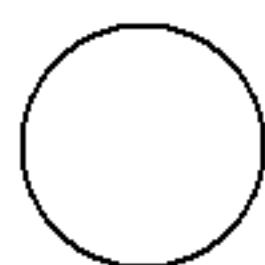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 QI



一九五九年

2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 ★

目 录

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在群众运动中的

作用..... 刘宁一 (1)

短
论

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

运动..... 许辛学 (5)

在新生事物面前..... 施东向 (7)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斗争..... 陈伯达 (11)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

的形势..... 李任之 (17)

路是人走出来的..... 欧 根 杨真慰等 (24)

关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若干问题

..... 关梦觉 (30)

编辑的话..... (41)



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

刘 宁 一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六千五百多名代表，代表着近三十万个先进集体和三百多万名先进生产者。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群英会”。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群众运动的壮阔声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宏伟景象。这次大会，检阅了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总结和交换了大跃进以来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经验。无疑地，它对于掀起更大的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全面跃进，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运动中，总是会涌现出无数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对于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的作用，我们党从来是十分重视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善于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大力支持群众的先进创

造和英雄行为。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曾经多次召开过在革命斗争或是后方生产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大会。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都不断召开过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党一贯重视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并且号召群众开展向先进人物学习的运动。

我们党所以一贯重视群众运动，一贯重视先进人物，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党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一直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先进人物是群众的优秀代表。重视先进人物，就是重视群众。为了领导和开展群众运动，为了贯彻党的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就必须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



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①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来的这个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它对于生产建设也是完全适用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到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就要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改革，创造生产的巨大高涨。因此，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②

我们党的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路线和政策，从来就是通过群众运动实现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产生大批先进人物，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工作中或是生产中创造出优异成绩，树立榜样，从而又推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再产生更多的先进人物，又推动群众运动更向前发展。这就是群众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正是掌握着这样一个规律，不断地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和培养先进生产人物，团结和依靠他们推动群众运动不断前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跃进。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

各个战线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大量涌现，成倍地增长，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这一规律。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快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因为这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涌现了成批的先进单位和英雄人物，他们作出了翻天覆地的事业，创造了我国从古未有的英雄事迹。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大量涌现出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好得很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对于劳动模范，也就是先进生产者的作用，曾经作过很好的概括，指出他们是群众运动的带头人，是人民群众的骨干，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先进生产者的这种“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必定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广大职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榜样。

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在群众中的榜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0页。

②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见1956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作用，首先在于他们思想先进，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坚定立场，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正由于这样，他们才能不断革新技术，在生产上不断创造奇迹。詹水晶所以能够那样勤勤恳恳，十年如一日，不出一件废品；徐永基所以能够那样刻苦钻研，突破薄壳结构设计尖端技术；马学礼所以能够那样诚恳帮助别人，革新技术，创造集体荣誉；徐学惠所以能够在紧急关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抢救国家财产，都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他们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他们热爱党和党的领袖，永远听党的话。他们有着高度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们有旺盛的革命干劲，虚心学习，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他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发扬了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勇于创造，敢想、敢说、敢做，富有钻研革新精神。他们有着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劳动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集中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战斗意志，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只要我们很好地组织群众学习先进生产者的这些崇高品质，就能够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而人民群众觉悟愈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也就愈快。

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榜样作用，还在于他们不断地用新的技术，突破生产定额，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生产任务。他们既是干劲冲天的闯将，又是技术革新的能手。他们所创造的先进经验，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群众学习和掌握了这些先进经验，就能够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赶上先进。群众生产技术的迅速提高，必然会推动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跃进。本溪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青年高炉的职工，用一个五十多年的老炉子，创造了全国高炉利用系数的最高纪录。这个创造，鼓舞了全公司职工和整个高炉炼铁系统的工人，使他们接连不断地创造出各项先进纪录，推动了生产的全面跃进。安徽省的小高炉炼铁，今年首先是马鞍山红旗二号小高炉的职工举起了高产、优质、低耗的红旗；接着，燕湖职工创造了小高炉的大面积丰产纪录，第二季度平均利用系数达到一点零八；继之，蚌埠职工八月份以平均一点一七七的成绩赶过了燕湖；九月份燕湖职工又以平均一点四三五的新纪录再度领先。这样，就促使安徽全省小高炉平均利用系数，由一月份的零点六三六，迅速提高到九月份的一点一二四。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很多。今年以来，各地组织先进生产者巡回表演，现场观摩，对于推动群众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带来了生产上普遍的大面积丰收。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开展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竞赛运动，是使先进人物和广大群众密



切結合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竞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作用，使先进經驗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广泛的群众中傳播开来，普遍提高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解决生产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同时，它又动员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人争先进，个个争上游，后进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使广大群众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现在，全国各地在开展大竞赛的同时，还加强了大协作。不仅在企业内部开展了大协作，而且在厂和厂、产业和产业、工业和农业之间也开展了大协作。这种国民經济各个方面的大协作，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将促使我国的国民經济繼續不断地跃进。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綫，反

对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因此，他們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击先进生产者，向先进生产者潑冷水。我們只有坚决同右傾机会主义作不調和的斗争，把右傾反透，保护先进生产者的积极性，支持先进生产者的首創精神，才能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持續不断地、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

现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已經胜利閉幕，六千多名代表带着党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各自的崗位。这許許多多先进人物，分布在全国各地，他們和全体职工一起，一定会使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起来，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并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争取一九六〇年国民經济的繼續跃进。

钻 工 之 歌

• 河北民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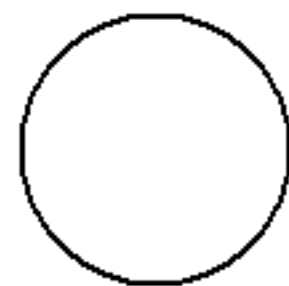
我爱钻塔高又高，
頂天立地入云霄，
钻塔下面馬达响，
钻塔尖上紅旗飄。

我爱钻机意志坚，
打入地球破层岩，

一根鉄臂三千丈，
不得煤层心不甘！

钻塔钻机是好汉，
終年伴我走千山，
千山万水都走遍，
开发山河找富源。

(原載“紅旗歌謠”)



更大規模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許 辛 学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在我們的工业和运输战线上，出現了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使生产、建設得到了一月高于一月的增长，得到了高产、优质、低耗、安全生产的全面跃进。現在我們的任务，是要使这个新高潮一浪高一浪地、持續不断地向前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必須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指导下，把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結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大量事实，我們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技术条件相同，干劲不同，劳动效果显然不一样。拿最近的事实來說，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許多企业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因为反对了右傾，鼓足了干劲，生产却比以前有很大的增长。党中央提出的反右傾、鼓干劲的号召的正确性，已經在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証明。

反右傾就是要強調政治挂帅，要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鼓干劲，能够更好地把政治和技术結合起来，能够使职工更好地注意掌握物质技术条件，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从而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上海建設机器厂全体职工今年一开始就热烈响应了上海市委繼續鼓足干劲、大鬧技术革命

的号召，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螞蟥啃骨头”的加工方法，从一只“螞蟥”一道道啃，变成几只“螞蟥”上、下、左、右、前、后成群結队地圍攻。这样，大大縮短了机架加工時間，从一只机架原来需要五十九天加工時間，縮短到三十天、二十天，最后只用十七天。全厂以四个半月的時間提前完成了两套六百三十公厘軋鋼机主机的任务，并在九个月時間內完成了一千一百五十余吨軋鋼机和轉炉等重要設備任务；一至九月份产值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工人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三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上繳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二倍多。又例如，大連造船厂的鋼工車間，为了要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任务，原来准备增加七十三名技术工人，后来采取了七项技术組織措施，解决当前生产中的关键問題，有的工序操作提高了效率十五倍，全車間不增加工人，就可以超额完成任务。

从多年来的大量事实看出，党中央提出的实干、苦干和巧干相結合，劳动热情和革新技术相結合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实行了这样的方針，就可以使广大群众能够經常地鼓足干劲，并且能够用同样的劳动消耗取



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效果。为了取得生产的持续跃进，我们必须把目前高涨着的群众运动巩固起来，并且持续地发展下去。即使现在群众干劲很大、群众运动已经很好开展的企业，也仍然要继续不断地做好这项工作。

又要苦干，又要巧干；又要高度的劳动热情，又要不断的技术革新。每个企业的领导同志都必须清楚地看到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提高劳动强度，可以使生产一倍、两倍地增长；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却可以使生产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千倍地增长。而且，技术的进步，能够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能够使职工有劳有逸地、比较均衡地进行生产，避免加班加点、时松时紧的现象。因此，要使群众的干劲持久下去，并且愈来愈大，一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引导群众发挥集体智慧，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地改进物质技术条件。

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企业，就目前的技术状况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技术落后的企业，这主要是大跃进以来新建的小型土法生产的企业，它们经过一年多来的技术改革，有的已经变成小型洋法生产的企业，有的已经变成“土洋结合”的企业，但是它们的大部分劳动，还是用手工进行的。这类企业迫切地要求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逐步实现半机械化以至机械化。第二类是技术比较落后的企业，这主要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企业，在解放以后，有一部分企业进行了扩建或者改建，采用了或者部分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但是就多数企业的技术条件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一类企业同

样迫切地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特别是需要改进设备，消除薄弱环节，使费力的手工劳动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第三类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这主要是全国解放以后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新建的大型企业。这类企业的设备是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但是它们在改善工艺、改进设备、改进产品设计等方面仍然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在提高设备效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比如，哈尔滨的量具刃具厂，是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由于这个工厂的职工最近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了技术革新，就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七倍多。有人认为，在技术落后和比较落后的企业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文章”可做，在技术先进的企业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必须从各类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可能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在方法上应当多种多样，在步骤上应当有缓有急。

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先进的变成更先进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们可以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所以，技术进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要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我们就应当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敢想敢做的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把放手发动群众和一切经过试验结合起来，把提高劳动技能和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结合起来。

在工业和运输部门中，广大职工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只是最近三个月以来，成功的事例就有几百万件，革新的能



手就有几十万名。我国的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创造才能。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更有计划地、更有组织地、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把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逐步地提高到现代化的技术水平。所有的企业都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在不断提高职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同时，不断提高新老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加强对新工人的技术训练，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这样就可能

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愈来愈多的革新家和发明家。

设备和工具的改革，对于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工人们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有了更多的生产经验和更高的劳动技能，就不但能够更好地运用现有的设备和工具，而且能够创造出效能更高的设备和工具。只要在组织生产中把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很好地统一起来，我们就能够使技术不断革新和不断革命，使生产不断跃进。

在 新 生 事 物 面 前

施 东 向

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创造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些光芒万丈的新生事物面前，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嘲笑？生活本身迫使每个人作出回答，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作了回答。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的伟大创造，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感。国内外的敌人，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疯狂的攻击。而党内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千方百计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污蔑和反对。

怎样对待新生事物，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

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无产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旧事物的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①

一切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是新旧斗争的

^① 见“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原稿。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7页。



过程，是新事物萌芽、苗长、壮大，旧事物衰老、死亡的过程，是新生事物经过曲折的道路战胜陈旧事物的过程。生物界中的新陈代谢是这样，社会当中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新生事物一经出现，必然冲击着陈旧的东西，它的出现，就预告了旧事物的灭亡，因此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生活中，迄今为止，新旧斗争很少不同阶级利益发生关系。在这个领域里，新生事物必然要触犯反动力量的利益，而一触犯反动力量的利益，便立刻会激起他们的阶级仇恨。

新生事物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必定战胜旧事物，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生活中，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归根到底是要胜利的，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胜利如何达到，则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新生事物，有哪一株没有经过坚忍不拔的艰苦战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坚决奋斗，如果不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打退，它们能够像现在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吗？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新生事物这一方面。共产党之所以永远能够站在历史行程的最前列，永远能高瞻远瞩，指引劳动人民奔向最远大的将来，就因为它始终紧紧依靠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无产阶级

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前途的阶级，它和最新的生产方式联在一起，“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资产阶级也曾经代表过新兴的东西，当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也曾经一度喊过反对旧制度的口号。但是曾几何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反对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又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了。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经被踢到垃圾箱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必定要被各国人民踢进垃圾箱里。

历史已经注定：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趋于消灭，个体经济制度，因为它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也不能摆脱没落的命运。只有无产阶级，能担当起解放整个人类的使命，因为它只有“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②无产阶级对旧的社会制度毫不留恋，它永远是建设新社会的先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除了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和贫困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失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只有消灭它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③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者”的时候，它也最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页。

② 同上书，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心于不断革命，因为它的利益就在于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就在于使社会生活不断更新。

正是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它永远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永远把最大的注意力倾注于新生事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完全是反映了濒于灭亡的资产阶级对新兴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的恐惧和仇恨。

当然，社会上的新旧斗争并不完全和阶级斗争联在一起。有些事情，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也会表现为新旧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消失。新旧斗争永远存在，是一个普遍规律。

反对新生事物的人，有一种理由：新生事物“有缺点”。

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新生事物既然是新的，它在发展中就没有现成的规矩可循，所以常常不可避免地要走些弯路，甚至还要受些挫折。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是新生的事物，它代表着未来；虽然有些缺点、走些弯路，它终于会战胜旧事物而取得统治地位。不管有多少缺点，它总比趋向死亡的旧事物要高明万倍。列宁说：“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们创造着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创造着新事物，他们的行动构成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他们实现着伟大的革命运动。群众运动扫除陈旧的渣滓，使新生的幼芽峥嵘茁长。这样一场摧枯拉朽、除旧布新的战斗，怎能没有缺点？身穿长袍站在堤上观潮的先生们，埋怨浪花溅湿了他的衣裳，觉得浪头太“粗暴”了。但是，这又何损于群众运动的伟大，又何损于新生事物的光辉？谁要是以为新生事物能够没有缺点，或者“应当”没有缺点，谁要是要求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刻十分完备，那就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他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因为现实生活不可能这样。硬是要求“没有缺点”的新生事物，那就只能是根本反对新生事物。

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并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有缺点。历来旧势力反对新事物，都是借口新事物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②

共产党人对新事物的成长，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同时在自己的工作中，又总是高度热情地关怀和培植新生事物，为新生事物的

①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页。

②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7页。



茁壮成长創造着各种条件，像园丁照护幼苗一样，像母亲撫养嬰兒一样。共产党人是新生事物的自觉的促进派。共产党人完全懂得，社会主义这样的新生事物是不可能自发地取得胜利的。当人民公社的雛形在中国农村刚刚出現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提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广泛开展以后，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又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促使人民公社这个偉大的新事物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难道事实不是这样証明着的嗎？

在新生事物面前，由于人們抱有不同的立場和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行动。有些同志对于新生事物，虽然并不像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全盘否定，但是他們或者怀疑动摇，或者无动于衷，或者一旁觀望。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資产阶级立場和思想对他們的影响。

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一切犯有右傾保守思想錯誤和反对新生事物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資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縛，脱离生活、脱离实践和脱离群众的。毛澤东同志曾經針对这种人說：“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

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药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①

社会主义革命一天天更加深入，社会主义建設一天天迅速发展，要求人們彻底拋棄各种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傳統、旧习惯，要求人們彻底清算資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②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告訴我們，生活是常青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們的思想必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使自己的認識合乎客觀实际。世界观問題不解决，即使对这个新生事物的錯誤态度得到糾正，还会在另一个新生事物面前犯出同样的錯誤来。一个人要能够永远站在新生事物方面，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就必须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日益发展，不断地进行自己思想上的革命，就必须根除資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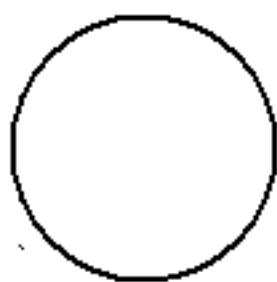
① 見“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頁。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 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就思想意識上說來，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

在黨的總路綫的旗幟下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全國人民都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而歡欣鼓舞。為什麼這時候在我們黨內却有少數人打起了反對黨的總路綫、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黨和人民相對立的地位呢？

我們必須從階級鬥爭的現象來看待這個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來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終結，而是階級鬥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上還沒有完全滅亡，只要階級還沒有完全消滅，只要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還存在，那末，就還會有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不但要採取各種辦法反抗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要採取各種辦法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資產階級反抗社會主義的鬥爭，不能不影響我們黨內的一些不堅定分子。黨內有些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頑強地保存資產階級意識的人，在階級鬥爭表現尖銳的某種時機，就往往要從無產階級政黨內部來進行反對黨的路綫的活動。這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不是別的，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反抗。

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帶着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黨的。他們實際上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就是說，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已經入黨很久，但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帶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總是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在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當然，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參加黨以前，也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在參加黨的時候，也還帶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的很濃厚，有的少一點。但是其中大多數在革命的鬥爭中，願意接受黨的改造，拋棄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接受了無



产阶级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可是，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有没有接受党的纲领呢？由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即使对于党的最低纲领，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资产阶级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资产阶级纲领。

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说来说去，不外两条：第一条，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条，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革命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群众运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惊惶失措，经常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现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更加表现惊惶失措，以致不惜进行种种的攻击和污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绝望的进攻。

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党的纲领问题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即集中到政权的问题，而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间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



样。列宁老早驳斥过那种所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们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们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认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社会主义，否认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一九五七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们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要求把他们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



市場和国外市場，而對於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來說，則是要求他們向資產階級的剝削感恩戴德。

馬克思說過：“勞動力的榨取者，在還有一塊肌肉，一根脈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內，是決不會放手的。”^①難道資產階級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的實質不就是這樣嗎？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承認“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在法國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時候，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但是，又不斷地指出了這些口號的極大欺騙性。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會把這些口號列入社會主義綱領，而且也不把它們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國主義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等等。總之，不論是在俄國或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作為綱領。並且，不只中國和俄國，凡是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的國家，只要那裏有馬克思主義政黨，他們也都不會把這些口號當作綱領，而總是把那種合乎本國人民群眾要求的具体鬥爭目標當作綱領，把人民奪取政權的問題當作綱領。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當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愛”這樣的口號當作綱領。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具体任務，就無異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②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還一直留戀着他們那種所謂“自由企業”、“自由經營”，農村一小部分富裕農民也仍然留戀着過去那種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機買賣的“自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於這些資產階級分子和富裕農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賞，並且往往成為他們在黨內的集中代言人。當着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注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要最後滅亡的時候，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用資產階級的“自由”觀來反對社會主義，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顯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樣。恩格斯說得好，“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真實內容，都歸結為廢除階級的要求。任何超越于這點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③我們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實際上也就是資產階級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窮人平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平等。這種說法歷來是資產階級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頁。

② “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頁。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頁。



他們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騙。

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階級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飾階級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階級平等化就是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傳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①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資产階級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的伎倆。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餓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②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階級剝削另一个階級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③

在地主資产階級統治的社会里，統治階級絕不会給被压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階級的平等”。在以无产階級为首的人民大众經過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階級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經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动階級之間，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階級专政下建設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階級，也不是要求什么“階級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階級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剝削階級的一种叫囂。資产階級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囂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傾机会主义者則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囂。

即使在階級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階級差别’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現在这个观念則像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④

右傾机会主义者滿腦子堆了那些資产階級的观念，他們在我們的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資产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产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馬克思

① 見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局信”（1869年3月9日）。

②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

③ 列宁：“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

④ 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0—41頁。



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由于他们怀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们总要闹别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照顾党的团结和全局，而一遇到大的紧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起来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领导。

现在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现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①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页。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形势

· 李 任 之 ·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的工业生产战线，和其他兄弟省、市一样，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全面跃进的形势。

安徽省工业基础原来非常薄弱。建国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安徽人民坚决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钢铁生产一马当先，其他各项工业生产也随着飞跃前进，安徽省工业落后状况开始迅速地发生变化。厂矿建设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工业面貌焕然一新。

安徽人民乘风破浪地前进。一九五九年，在工业战线上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增产节约高潮，显示了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景象。今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的继续跃进，有下面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钢、铁产量加倍跃进，其他各项工业生产增长幅度很大，保持了高速度发展。今年全省钢的产量，按国家计划为十三万吨，一至十月份生产了十三万六千吨，已

提前六十四天完成国家计划；铁产量按国家计划为一百八十万吨，今年一至十月份已生产了一百六十三万吨；煤炭产量按国家计划为一千五百万吨，一至十月份已生产了一千二百六十八万吨。在以钢为纲的带动下，其他各项工业产量，据统计，今年一至十月份比去年同期都有很大增长：机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电力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棉纱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三。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计划为四十亿元，一至十月份已完成三十五亿零五百万元，预计全年的完成数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多。这种增长速度是较高的。在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中，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是全面跃进的。以炼铁生产为例：一月份小高炉利用系数只有零点六三六，十月份提高到一点二六；焦比一月份为一点九七六，十月份下降到一点一三九；生铁合格率三月份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七，十月份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九点零四；生铁成本第一季度平均每吨为四百六十七元，十月份降低到平均每吨二百六十二元。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提高。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在工业系统中动员了三十多万人转移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



而工业生产依然保持高速度发展。这样，基本上实现了高产、优质、低耗的要求。

另一个特点是：各个工业部门不仅逐月做到了均衡生产，而且工业产量都是稳步上升的。今年一至十月份，安徽省钢、铁、煤等主要工业产量的月产水平，是不断增长、步步提高的。在七月份，小高炉铁的产量比六月份略有下降，但省的重点企业马鞍山钢铁公司，生铁产量仍然是上升的。今年夏天，虽然个别工业部门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来的一股冷风的影响，产量有点小的波动，但由于省委顶住了这股歪风，这种情况也就很快扭转过来，从总的方面说来对我们没有大的影响。

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正进一步改变着安徽省的工业面貌。过去，安徽省主要工业产品一向依赖外省供应，现在，大部分能够自给，有的产品还能向省外调出。过去，许多设备不能自己生产，现在，对于工业上的某些设备，如一般的矿山、冶金、电动机、机床、仪表、运输以及农业和水利等机械产品，自己都能制造，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安徽省工业残缺不全，现在，很多重工业、轻工业，大型的、中型的和小型的企业，都已经逐步建立起来。

二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的工业生产，为什么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继续全面跃进呢？这首先是由于坚持党的总路线，坚持跃进指标，不断地反右倾、鼓干劲的结果。

安徽省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国家计划，制定了省的跃进指标。省委经过反复研究，根据主观力量（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很足）和客观可能（现有生产能力），制定了省的跃进计划，比起国家计划来，钢增产十万吨，铁增产三十六万吨，煤增产一百万吨。完成这个增产指标，虽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如运输力量不够，炼钢设备能力小，技术上还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等，但并非不能克服的。我们认为，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许可，经过主观努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固然不可勉强去做，但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经过主观努力完全可以办到的事，一定坚持要办。我们不仅看到在实现跃进指标中存在困难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重视去年大跃进中克服困难的丰富经验。我们肯定，只要鼓足干劲，充分利用炼铁设备能力，挖掘煤炭生产潜力和加速炼钢转炉建设，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省的跃进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深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号召苦干巧干，力争上游，不但要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要保证完成省的跃进计划。

今年六月，国家调整生产指标时，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调整指标态度必须是完全积极的，并且必须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步骤，有些企业的指标，原来就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企业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实现指标的各种具体措施，保证原定指标的超额完成；根据这一精神，检查了上半年省的计划的执行情况，认为省原定的



跃进指标是实在的、可以实现的。我們認識到，落实指标与跃进指标是統一的，落实必須是落于先进之实，落于鼓足干劲之实。落实决不允許成为松勁畏难、右傾保守的借口。在客观情况許可的条件下，只要跃一跃可以摘到手中的果子，就应该充分發揮干劲去摘取。我們及时地批判了某些干部提出的不适当地降低指标的錯誤思想，鼓舞干部和群众繼續发揚冲天干劲，防止产生松勁情緒。“气可鼓而不可泄”。由于我們对完成跃进指标采取了坚定态度，不断地鼓舞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因而目标明确，思想坚定，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为实现今年跃进計劃而英勇奋战，使工业战线一直保持着繼續跃进的形势。

今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繼續跃进的过程，也就是同右傾保守思想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根据去年大跃进的經驗，认真地不断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是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和实现跃进指标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右傾是主要的危險和长期的危險，我們必須經常警惕，同右傾保守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在工业战线上，右傾保守思想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不同問題而出現的。一般地說，在生产計劃完成得較好时，容易滋长自滿和“歇一口气”的情緒；在生产計劃完成得不好或遇到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难需要解决和克服时，容易产生畏难情緒。这些思想情緒的实质都是右傾。如果不及时克服，就会松勁泄气，妨碍跃进指标的實現。

今年年初，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在超额完成去年工业生产任务以后，产生了松勁情緒，他們錯誤地认为“去年苦战了一冬，今年应该歇口气”，“今年日子还长，慢慢干没有关系”，因而使工业产量有所下降。經省委大鼓干劲，強調均衡生产，防止先松后紧以后，在思想上和生产上迅速地扭轉了上述情况。二月份我們遵照国家計劃制定省的跃进指标时，具有右傾思想的人，又反对我們加碼。针对这些右傾保守思想，我們及时組織了辯論，通过算細賬，坚定了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坚持了跃进計劃。

在执行計劃当中，必然会遇到許多困难，問題是我們如何对待这些困难。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总是以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問題，只向后看，不向前看；只看到困难，看不到已有的和正在不断創造中的有利条件；只看到物的因素，看不到人的因素。他們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他們在困难面前成了矮子和懦夫，无能为力。今年三、四月間，小高炉事故一度較多，产量上不去，质量提不高，成本降不下来。这时，有右傾思想的人又跑出来給群众潑冷水。为了同右傾思想作斗争，我們加强了职工的共产主义風格的教育，強調事在人为，強調充分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发动职工大搞技术革新，积极钻研創造，猛攻技术关。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干劲、钻勁，使小高炉迅速获得高产优质。这就用鉄一般的事实批判了右傾思想，大大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今年下半年，我們在堅持躍進指標、深入貫徹中央關於反右傾、鼓干劲的指示，展開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的時候，更廣泛更深刻地批判了各種右傾思想，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進一步認識到，右傾思想和堅持黨的總路綫、堅持繼續全面躍進是水火不相容的，從而更深入地掀起了增產節約運動的新高潮。

今年以來，安徽省工業生產的情況表明，不斷地反右傾、鼓干劲，對促進生產起着重大作用。在同樣條件下，干劲不同，效果也就大不相同，一松勁生產立刻下降，一鼓勁生產頓時上升。有許多事情，客觀條件雖然具備，但如果有右傾思想，干劲不足，死氣沉沉，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本來可以辦到的事情，也會落空。相反，有很多事情，客觀條件雖不完全具備，但如果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动性，鼓足了干劲，化阻力為助力，變不利為有利，客觀條件就會隨着改變，本來認為難以辦到的事情，也可以辦到。同時，經驗又告訴我們，在有些人的頭腦中，右傾保守思想十分頑固，這個時期克服了，另一個時期又可能產生，在這種情況下以這種形式出現，在另一種情況下又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當然，萬變不離其宗，右傾保守思想終歸是對生產起促退作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經常的任務。不斷地反右傾，把右傾反透，不斷地鼓干劲，把干劲鼓足，這是贏得全面躍進的基本保證。

今年安徽省工業之所以能夠繼續全面躍

進，還由於認真地、堅決地、全面地貫徹執行了黨的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今年安徽省鋼鐵產量能夠加番躍進，主要是去年大辦鋼鐵中建立起來的“小洋群”發揮了巨大作用。因此，今年我們在煤炭、機械、化工、水泥、輕工等部門，也進一步大搞大中小結合，大搞“小洋群”，這樣就大大地推動了這些工業部門的高速度發展。

“為着要領導，必須有預見”。我們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導，在去年大辦鋼鐵中，考慮到當時任務大、時間短，既要完成當年任務、又要考慮長遠發展，既要完成數量、又要保證質量的情況，根據中央提出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結合本省具體情況，決定大抓鋼鐵工業“小洋群”的建設。在貫徹中央方針時，一方面加強了對馬鞍山鋼鐵公司等大、中型企業的建設，另一方面採取“洋土結合，以洋為主”的做法。在土法煉鐵有基礎的大別山區，大搞“小土群”，同時根據就原料、就交通運輸、就動力、就幹部、就技術的“五就”原則，在工業較有基礎的合肥、淮南、蕪湖、蚌埠、馬鞍山、安慶、銅官山等城市，集中力量大搞“小洋群”。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全省就建成了八立方米以上的高爐八百多座，總容積達九千七百多立方米，使全省迅速建立起許多中、小型鋼鐵企業。這些小高爐的建成，不僅使我們超額完成了去年鐵的生產任務，而且為今年鐵產量的迅速增長打下了牢固基礎。今年全省的鐵產量，小高爐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小洋群”已經全部代替了“小土群”。小高爐經過一系列的技术改



造，各項經濟指標上升很快，有些小高爐的生產技術，已經達到了大高爐的水平。在今年安徽省鋼鐵生產繼續躍進中，“小洋群”的優越性表現得十分顯著。

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進行任何工作，都必須抓住主要矛盾，他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①所謂主要矛盾，也就是工作中的關鍵問題。去年我們大抓鋼鐵“小洋群”建設，集中全力解決了大辦鋼鐵中的關鍵問題，因而保證了去年和今年鋼鐵生產的躍進再躍進。今年春天，省委又適時地大抓煉鋼轉爐的建設，改建和新建了四十二座三噸煉鋼轉爐，今年下半年陸續建成投入生產以後，鋼產量迅速上升，使完成二十三萬噸的煉鋼躍進指標，有了可靠的保證。明年我們打算大抓化肥“小洋群”的建設，以促進農業的更大發展。

我們在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大中小結合、洋土並舉的方針中，是經過一番爭論的。當時會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搞大不搞小，搞洋不搞土，一味強調大的洋的產量高、質量好、成本低，單純依賴大的洋的。一種主張是搞小不搞大，搞土不搞洋，片面強調小的土的容易搞、來得快，滿足於“小土群”。省委指出這兩種主張都是不全面的，都是一條腿走路而不是兩條腿走路。安徽省的具體情況是礦產資源豐富，群眾熱情高漲，這是有利條件，是基本的方面；但是經驗缺乏，工業基礎薄弱，這是不利的一面。顯然，我

們既不能單純依賴大的洋的，也不能滿足於“小土群”。大型企業具有產量高、質量好、勞動生產率高等許多優點，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集中力量建設一批現代化的大型企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建設大的洋的所需投資多，建設時間長，設備不易解決，技術難以掌握，投資效果發揮慢，在時間和任務緊迫情況下，單單地指望搞大型企業是不現實的，是會妨礙發揮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的。而小型企業和土法生產，能够在最大範圍內、組織群眾參加，適應資源分散和工業基礎薄弱的特点；但又決不能停留在土法生產上，必須按照實際情況，有條件地逐步向“小洋群”發展。

根據中央“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結合我省具體情況，我們堅決地在鋼鐵和其他工業部門中大搞“小洋群”。“小洋群”所需投資少，建設快，設備易于解決，技術容易掌握，接近原料產地和消費地區，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資源，充分滿足人民多種多樣的需要，並迅速為國家積累資金。安徽省工業生產發展的實踐證明，堅決執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大搞“小洋群”，對加速工業的發展，意義極大。馬鞍山鋼鐵公司過去用八年的時間，只建立了中型高爐一千九百多立方米，而在去年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全省就建立了小高爐近一萬立方米。大搞“小洋群”，充分地調動了廣大群眾辦工業的積極性，打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點，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鍛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0頁。



炼了干部，培訓了大批技术力量。大搞“小洋群”，还迅速地改变了安徽省工业的布局，充分利用了分散的资源，使工矿企业密布全省。我們只要对“小洋群”在技术上不断加以装备和提高，就可以使“小洋群”逐步地发展为中、大型的洋法生产。事实証明，那种怀疑“小洋群”不合算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現在人們对“小洋群”是相信了，沒有爭論了，在其他工业部門大搞“小洋群”的条件也更好了。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着的，現在我們是肯定、巩固、发展和提高“小洋群”，当条件已經成熟，事物发展到引起新的飞跃时，我們就应当分別地分批地把“小洋群”发展为中、大型的洋法生产。我們必須有这种精神准备，也必須为这种新的飞跃积极創造条件，这也就是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的进一步貫徹。

今年安徽省工业之所以能够繼續全面跃进，还由于实行了集中領導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結合的方針。

在工业生产中要实行集中領導。社会主义工业是一个整体，各个部門之間的关系极为密切，一环扣一环，一处发生故障，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領導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設，好像指揮現代作战一样，战斗既緊張，兵种又复杂，必須实行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特別是組織以鋼鐵为中心的大跃进，在生产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厂矿单位多，分布面广；原材料供应量大；运输任务重，运量大和运力小的矛盾非常突出；电力供应跟不上生产飞速发展的需要。这些問題如不及时解决，

就会影响生产的不断发展。而这些問題，牽涉的部門很多，范围很广，只有实行集中領導，統一安排，才能解决各种矛盾，保証共同跃进。

安徽省在实行集中領導方面，省、地、市委都成立了工业領導小組，統一指揮各个工业部門的生产和建設工作。在加强集中領導时，着重“三大抓”：一是大抓原材料的供应，大力組織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加强对生产的檢查督促，实行統一調度，广泛組織协作；并大力組織运输，为此，成立了运输指揮部，統一調度运输工具，分別輕重緩急，逐日进行安排，解决各部門之間在运输方面的矛盾。二是大抓重点建設，根据不同时期生产的发展，集中力量突击重点。去年大建小高炉，全省由上到下都成立了冶金指揮部；今年大搞轉炉建設，又成立了鋼厂建設指揮部；明年准备着重搞化肥厂建設，現在又成立了化肥建設指揮部。这样，一个时期抓一个重点，集中优势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一个个突击，問題一个个解决，就大大地加快了建設速度。去年四個月內建成八百多座小高炉，今年六個月內建成四十二座三吨炼鋼轉炉，生动地說明了这是取得不断跃进的一种好办法。三是大抓对薄弱环节的領導。在工业生产中，經常出現一些薄弱环节，我們一发现这种情况，便立即采取措施，加强这方面的領導，組織專門工作組深入現場，帮助工作，派負責干部坐陣督战，务必扭轉局面，保証生产建設的順利进行。实行集中領導，不仅不削弱下級的領導，不妨碍下級的积极性，相反地，大



大加强了下级的领导，调动和发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在领导工业生产中，既要集中领导，又要大搞群众运动。高度的集中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激发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生产的蓬勃发展。安徽省在去年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广泛开展了以“高产、优质、低耗、安全”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竞赛热潮。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我们进行了“鼓”“比”“革”“管”“巩”五个方面的工作。“鼓”就是不断鼓干劲，大讲形势任务，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各种右倾错误，使广大群众树立和巩固力争上游的思想，经常保持饱满情绪和旺盛斗志。“比”就是在组织竞赛时，不仅比干劲，还要比钻劲、比创造；不仅比数量，还要比质量、比节约、比成本、比克服困难、比自力更生；不仅比小面积高产，更要比大面积丰产；不仅比生产大丰收，更要比思想大丰收。“革”就是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动工人苦干结合巧干，学技术、钻技术、攻科学、动脑筋、找窍门，帮助新工人提高技术，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三结合，共同研究解决本企业生产的关键问题。“管”就是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通过群众

运动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有利于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以保证均衡生产，保证高速度发展。“巩”就是不断巩固群众的劳动热情，干部坚持经常参加劳动，亲临生产第一线，深入生产中去领导生产，深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并密切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要，与群众同脉搏、共呼吸，及时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群众干劲经久不衰。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广大群众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威力和无穷无尽的智慧，许多厂矿企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一经群众讨论，就很快得到了解决；许多原来认为无法克服的困难，只要依靠群众，就很快克服了。安徽省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推动了生产的全面跃进，不断地创造了奇迹。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的形势虽然很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缺点，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工业生产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当前生产中，有些问题尚待我们努力解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更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把右倾思想彻底反掉，把干劲鼓得更足，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积极作好生产准备工作，争取明年的继续跃进。



路是人走出来的

——記大理白族自治州凤鳴人民公社

欧 根 楊 真 慰 陈 渭 庚
張 春 虎 李 澤 藩 兰 炳 丞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凤鳴人民公社成立才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水利化，建立起拖拉機站，發展了農、工、林、牧等業及各種土特產品和手工藝品的生產。一個多災多難的貧困地區，現在已經變成牛羊成群、魚鴨滿塘、糧食滿倉的富饒之鄉。各族人民亲身体會到，人民公社的確像早晨的太陽一樣，為他們照亮了通向幸福的大道。

再不能那樣“小合作”了

凤鳴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六月由原凤儀縣全縣和下關市郊區共二十四個高級社合併成的（當時叫大聯社）。一九五九年八月，為了使郊區更好地為城市服務，又將下關市郊區劃出，另成立郊區公社。現在凤鳴公社有九千四百七十六戶，四萬三千三百零七人，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二畝田地，大部分是平壩，也有山區和半山區。這是一個多民族聯合的公社，有白、彝、漢、回、傈僳等五種民族，其中以白族為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傈僳族最少，只有十三戶，一百一十三人。一九五六年初，原凤儀縣建成二十一個高級社，實現了高級合作化。一九五

七年底，在黨中央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偉大號召下，各族人民很快就掀起了一個熱火朝天的生產高潮。要實現農業大躍進，就必須大修水利，大辦地方工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在這些任務面前，原來的高級社就開始暴露出規模小、土地少、人力物力財力單薄等一系列和大躍進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於是，各社的社員和幹部就紛紛要求把各社聯合起來。

促使許多高級社聯合起來的，首先是興修水利的運動。凤儀縣是個旱、澇災害比較嚴重的地區，各族人民長期以來就希望在波羅江上游修個大水庫，根除旱澇災害。但是這個水利工程需要破土幾十萬立方米，築三十多米高的大壩，單靠一個高級社或幾個高級社的力量是修不起來的。而且修的時候，需要占用三哨高級社八百多亩好田，還得移走兩個小村。因此，雖然在一九五六年就有人提議修這個水庫，却一直沒有修成。大躍進的號角響起來以後，各族農民為了儘快地擺脫“一窮二白”的狀況，都願意聯合起來，共同修建這個水庫。三哨高級社的漢族農民說：“既然能解決壩區十幾個合作社的災害問題，占去八百亩田不要緊，我們再到山上開荒



去。”壩区的白族农民，主动划出四百多亩好田給三哨。大家还願意帮助需要迁移的两个村落另建新村。山区的彝族和傈僳族农民虽然用不上水，也願意出人支援。他們說：“只要壩子上增产，我們山区也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各族农民的要求下，县委决定組織全县二十一个高級社联合修三哨水庫。一說修水庫，很快就集中了四千多人。到一九五八年夏初，水庫就开始发挥作用。各族农民看到，单个高級社办不到的事，联合起来就办到了，因此，要求联合起来大修水利的勁头越来越大。海东、海南等四个高級社要联合修老太山水庫。凤仪县的凤鳴和下关市的福星等五个高級社，要联合修凤鳴水庫。錦阜、芝华等四个高級社的男劳动力去修三哨水庫还没有回来，妇女們就要联合起来修个“三八”水庫。大修水利的高潮把社界、乡界、县界一齐冲破了。

大跃进的形势步步逼人。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緊張的栽插季节又快到了。時間紧，任务重，劳动力不足。两面同时作战，哪一个高級社都有困难。这时，大家一面考虑在栽插中互相协作，一面就开始想到购置农业机械的問題。就在这个时候，下关运输总站保养厂試制成功一台拖拉机，在凤仪县石龙村試犁。各族农民听说“鉄牛”犁田，男女老少都赶着去看。“鉄牛”犁得又快又好。人們看到，有了拖拉机，就可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可是，单靠一两个高級社的力量，又怎能买得起拖拉机呢？于是，他們很自然地想到“联合起来”。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在全县干部會議上，有人就提出联合办大社的問題。会后，海东、海南、江西、三哨、后山、石龙、滿江等許多高級社又正式向县委提出

并社的要求。海东、海南的四个社湊錢到昆明去买汽車；江西、后山、三哨三个社也联合到祿劝县去买籽种，还联合起来修了一条从江西白族地区直通后山彝族地区的十多公里长的公路。由几个高級社和几个民族联合办的农具工厂也出現了。事实上，群众的这种行动已經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协作，而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改善生产关系。

大跃进的形势发展得很快，群众的要求越来越多。联合起来发展生产，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当时，县委的领导同志中多数人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也有少数人反对联合修水利。他們說，联合修水庫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偷鸡不着蝕把米”。另外还有人动摇于两者之間，既感到联合办大社是大势所趋，不办不行，又怕沒有机械，大社办不成。

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經开始。大修水利、大积肥料等一系列活动很快就在各地搞得热火朝天。那些动摇犹豫的同志，經過一番观察和考虑以后，也轉到积极支持群众运动的方面来。而反对兴修水利的县委委員范錫功，却在海东、海南一片地方，和少数富裕农民連成一气，压制群众大跃进的行动。群众要掀掉老太庙修水利（这个庙修在出水口上面）。富裕农民楊錫鈞說：“掀不得。掀掉管水的老太神，水出不来。”范錫功也对干部說：“干不得，干了会脫离群众。”楊錫鈞說：“不要心大压着肺。”范錫功也說：“癩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好，就是做不到。”但是群众要求联合起来搞大跃进的热情，却越来越高，誰也阻擋不了。县委书记陈凤照同志，代表县委向群众明确地表示了支持他們的态度以后，群众情緒更加沸騰起来。他們



說：“天鵝肉也是人吃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有毛主席領導我們，就是地塌了，我們也有本事修補起來。”文武高級社黨支部書記楊富業（白族）帶頭把“老太神”砍倒，接着二、三百人沖上去，一下子就把老太廟全部掀掉，放出一股活龍潭水來。各村群眾聽見這個消息，紛紛自帶工具、行李趕來參加，幾天之內，水利工地的人馬就上齊了。

不久，那個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范錫功被揭發了。他不僅反對聯合修水庫，還惡毒地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斗倒這個右派分子以後，全縣幹部和群眾的眼睛更亮了，要求辦大社、走社會主義大道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縣委會又向群眾提出“搞好生產，迎接辦大社”的號召。于是在省委、地委的同意下，經過大理市委（下關市和鳳儀縣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合併為大理市）的積極籌備，鳳儀縣和下關市郊區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正式合併為一個大聯社。不久，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也傳達下來，各族人民更加干劲冲天，决心以新的生产高潮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各族群众齐声拥护办公社。江西管理区白族农民說：“小社小增产，大社大增产，人民公社全面发展。这回毛主席領導我們又高升了一步。”山区吊草村的彝族农民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怕壩区嫌他們产量低，全村立即昼夜赶种晚秋作物，并且催支部书记翟鈞赶快下山，向壩区农民提出保證：“山上的彝族决不落后，我們的单产虽然达不到千斤，可以多开些荒，每人平均粮食要赶上你們。”住在高山上的傈僳族农民，也派代表赶下山来，要求全部加入公社。两三天內，各

族农民就写了成千上万張大字报、申請書、保證書、决心書，要求参加人民公社。于是大聯社就正式改組為鳳鳴人民公社。这是白族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它对于自治州迅速实现公社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穿心江”变成了“幸福江”

鳳鳴公社三面环山，北临洱海，波罗江从南往北，两岸是个狭长的小壩子。解放前，由于水利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波罗江越来越小，壩区五万多亩土地就有四万多亩因缺水而不能按时栽插。处于波罗江下游的鳳鳴鎮、石龍、滿江等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二万多亩稻田要改种旱谷，而雨季一到，山洪暴发，沿江两岸的几万亩稻田又要遭洪水淹沒。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上下游各民族之間常为爭水鬧糾紛，以至发生流血慘劇。云乐村的“閻王壩”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各族农民一提起这条江，就如尖刀穿心，多年来都把它叫做“穿心江”。

解放后，年年治理，波罗江两岸的情况已經逐步好轉。到一九五七年，灌溉面积就增加到四万二千多亩，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多。但是沿岸仍有一万多亩稻田因缺水灌溉，不得不种旱谷。遇到特大的洪水，还不能控制。大跃进和公社化以后，公社統一調配劳动力，用了三十八万多个工日，修建中型水庫四个、小型水利工程一百四十多处，增加灌溉面积达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亩，等于解放七年来所修水利总和的一点八倍。目前，全部灌溉面积达六万九千多亩，基本改变了“十年干旱九年涝”的面貌。能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的三哨水庫，已完成工程量的



百分之六十。这个水庫建成后,既能把波罗江上游的特大洪水全部拦蓄起来,又能在干旱时期保証三万多亩稻田的灌溉,对壩区十个管理区的增产有着决定的意义。一九五九年春耕期間,这个未完的工程所蓄水量就已經灌溉了一万九千多亩田,使下游的凤鳴、石龙、滿江等管理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芒种”时基本結束了栽插。乐和管理区慈航村,过去干旱严重,每年群众都要作三套准备:先是种旱谷;旱谷干死了,改种包谷;包谷干死了,改种蕎子。一九五八年实现水利化以后,能够按季节栽插,每亩水稻产量达到六百斤,比过去增加了五倍,缺粮村一下变为余粮村。海南管理区在水利建設高潮中,从下河村挖了一条八丈寬二十里长的排水沟到洱海,使一个八百多亩大的烂泥塘变成了良田,一九五八大春淨增稻谷四十多万斤。这个每年缺粮达二十万斤的穷地方,一下子就变成了余粮区。

現在,凤鳴壩子已变成魚米之乡。“穿心江”已成“幸福江”。

一九五八年,全公社粮食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四,每人平均有粮食一千一百二十六斤。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到連續七个月多的干旱,小春粮食单产仍然由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二十多斤提高到二百七十多斤。据公社党委估計,全年粮食产量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各族社員眼看着大片稻谷穗大粒飽,高兴地說:“这样大面积的好谷子,从来沒有見到过,真是一籬谷子一籬米的好年景!”普和村白族农民赵貴田的媽,今年已經七十多岁了,眼睛早已失明,她到田边摸摸沉甸甸的谷穗,又摸摸滿沟的流水,說:“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公社真好,过去是各民族

为水打架,現在是团结修水利。”

老牛换成拖拉机

“人民公社力量大,又盖工厂又发电,老牛换成拖拉机,决心实现机械化。”各族人民这样歌唱着人民公社成立后的新景象。

原凤仪县在工业生产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紙。壩区的白族、汉族农民只經營一些手工业。山区的彝族、傈僳族,除了砍木料、織麻布以外,沒有其他手工业,农具坏了,还要拿到几十里路外的下关去修理。大跃进以来,各族人民都迫切要求买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但是在高級社的时候,买不起拖拉机。江西高級社白族农民有电力,有鉄匠、木匠和一定的技术設備,就是因为資金不足,燃料、木料缺乏,想建立个农具厂也建立不起来。后山彝族的高級社虽有丰富的燃料、木材,但因沒有鉄木工和技术設備,建立工厂就更加困难。

公社建立以后,党委根据各民族的共同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大办农具制造修配、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加工和日用品加工等四类工业,新建各种大小工厂二百三十四个。錦阜管理区住在山头上的七戶傈僳族,也派人下壩来和白族人民合办了一些工厂。

由于公社經營項目多,收入多,积累也多,公社和管理区可以不断地从积累中提取現金,給各厂增添設備。公社給各农具厂先后添置了翻砂設備、鑄件工具、鼓風机和車床等,使农具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一年来,各农具厂共制造、改良了各种农具八万六千多件,为社員修补小农具十万多件,并生产出一向依靠昆明、下关等地供应的步犁、打谷机、播种



机、压面机、碾米机、牛車、馬車等較大的生产工具。接着,公社又购买了汽車二輛、拖拉机十一台、抽水机三部、发电机五台、四行播种机八部、馬車二百六十二部和其他大型生产工具三百多件,还建立起拖拉机站、馬車运输队、小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等。乐和、江西、北淌天三个村子也已經安上了电灯。

在大办工业中,通过請人来教、派人去学,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老师傅带徒弟,举行現場会和組織观摩評比等办法,一年来共培养了各民族技术工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江西农具厂的白族青年工人周紹唐,过去什么技术都不会,进厂后不到三个月,就和張品松、楊傳等人一起,經過几次試驗,造出了簡易車床。这个厂的白、汉两族工人,还帮助四个彝族农民学会了打鉄、做木器的技术。彝族的社員說:“办了人民公社,我們彝家也有工人啦!”党委还特別关心少数民族女工的成长。过去是家庭妇女的白族王美英,现在是白族地区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另一个白族妇女赵秀仙,則成为凤鳴公社的第一个女机械工人。

一年来公社大办工业和购置的农业机械,已經在农业生产上發揮了显著的作用。拖拉机在春耕期間就为耕牛不足的石龙、滿江、云乐等管理区翻犁了二千八百多亩稻田。到秋收秋种时期將翻犁一万亩左右。据公社党委会的同志說,如果再购买两部履带式拖拉机,机耕面积就可达到四万多亩,壩区可以基本上实现机耕化。馬車运输团在今春緊張的麦收季节中,四天時間就将石龙管理区的一千四百多亩小麦搶运了回来,使这个地区能够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栽完了秧。

朵朵金花放光芒

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有条件做到統一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經營。根据这一特点,公社党委从公社建立时起,就注意發揮各民族的特长,組織他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兴林、牧、副、漁各业。

海东、海南管理区是馳名国外的大理雪梨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白族人民已有几百年的植梨历史。解放后,梨产量虽然年年增加,但速度比較緩慢。公社成立后,才开始大量培育树苗,供应各管理区嫁接。仅海东管理区梨园面积就增加了一千亩,等于解放后七年内增加面积的两倍。公社化后,管理区又統一調配劳动力管理梨园,使一九五九年雪梨获得了大丰收。仅此一項,全管理区就可收入七万多元,平均每户七十元,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一倍多。

滿江管理区紧靠洱海,这里的白族人民擅长捕鱼。过去由于資金困难,劳力不足,只捕不养,产量不大。公社化后,修建起了育苗魚塘和商品魚塘;公社又从后山、华营等产麻区調来一部分麻供他們編織和修补魚网。一九五九年該区的魚产量可以达到三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两倍。

彝族聚居的后山管理区,是个山区,有山、有水、有草場,彝族人民又有育林和养羊的經驗,很适于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但是这里只有一百三十多户,二百四十个劳动力,生产技术也很落后。过去是顾了粮食生产,就顾不了别的。現在公社确定这里主要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一年来,这个管理区除了护育山林以外,还开辟了梨园、茶园、核桃园、花



椒园、棕树园，共种植了十多万棵树。养羊方面，除了自用和出卖的一百多只以外，现有山羊、绵羊共八百九十只，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

住在江西管理区海拔二千三百多米高山上的六户傈僳族，解放前到处飘泊，解放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公社化后，管理区根据他们长期种山地和牧羊的习惯，要他们多种包谷多养羊。一年来，他们的羊已由一百一十只增加到三百三十六只，牛由十八条增加到三十二条。彝族、傈僳族人民说：“公社真好，会做梁的做梁，会做柱的做柱，有气力都使得出来。”

现在公社已建立起一个畜牧农场，购买了荷兰牛、约克夏猪、高加索羊、安哥拉兔等新品种，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和改良牲畜。目前全社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已发展到一万一千八百头。公社还根据集体饲养和社员私人饲养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发展养猪、养鸡、养兔、养蜂等副业生产。目前每户平均养猪二头多、鸡九只、兔二只。

这里的名产“赵州丝”，在公社成立以后，也得到了发展。城镇的汉族居民，有养蚕、缫丝、做丝线的手艺，他们做的丝线为滇西一带白族、彝族、傣族、纳西族妇女所喜爱。公社成立了蚕桑农场，同时还在凤鸣镇、石龙、乐和、江西、锦阜、满江等管理区发动群众种桑养蚕，今年可产茧三千斤以上。

公社化以后，农、林、牧、副、渔各

业并兴，农村经济十分活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也大为发展。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全社商品生产部分占全部生产产品的百分之六十，商品销售额共达一百九十二万三千元。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市三万多人口所需的猪、鸡、兔、鱼、蔬菜、水果等食品，主要就是靠着这个公社供应的。各族社员都欣喜地说：“公社化以后，朵朵金花都大放光芒。”

（注：这个材料是作者在1959年9月调查的）



向湖塘要肥料（木刻）

彭志雄



关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若干问题

——对胡鈞同志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一文的商讨

关 梦 觉

胡鈞同志在“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上所发表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一文，主要论点是否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商品价值关系，他特别着重地说明了国家卖给国营企业职工的消费品并不是商品，仅有商品的“形式”，在这里，并不存在着真正的商品关系。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固然都值得进一步地展开讨论；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鈞同志对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问题的看法，本文主要就是想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一些意见，只是附带地涉及到一些其他问题。

一、关于劳动交换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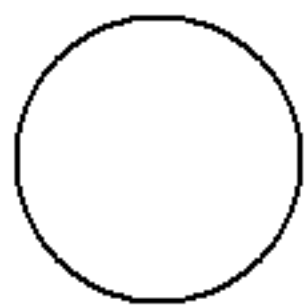
因为胡鈞同志是以劳动的等量交换或不等量交换作为自己全部论点的基础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问题的谈起。

胡鈞同志认为人们之间生产劳动的交换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商品交换关系，即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交换，在这里，“生产者是在物的形态上，把自己的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进行劳动的交换。而人们借以实现其劳动交换的物品就是商品”；另

一种是非商品交换关系，即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这两种劳动交换关系的最本质的区别，据说乃在于商品是“有物”的，而直接的劳动交换则是“无物”的。在胡鈞同志看来，这种区别之所以带有关键性，乃是因为以物为“纲”的劳动交换、即商品交换，由于“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以致“不管实际劳动消耗怎样，等量等质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场上换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而“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内耗费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商品交换，实质上并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只有不以物为媒介的劳动交换、即直接的劳动交换，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抛开生产资料质量的影响，而只核算劳动本身的质量和数量。”

我认为，胡鈞同志以“有物”或“无物”为分界线，把商品交换和所谓直接的劳动交换互相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值得研究的（至于商品交换是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以后再谈）。事实上，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是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交换，即在



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交换或劳动者互相交换其活动。这种劳动交换是生产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说：“在生产本身中实现的活动与能力的交换，显然是直接属于生产并且构成生产的本质的东西。”^①“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自己也互相影响着。他们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从事生产。”^②只有这种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的劳动交换、即活劳动的交换，才不采取物的形态。但胡钧同志所说的不采取物的形态的劳动交换，并不是指此而言的。

第二，是交换领域中的劳动交换，即商品交换。恩格斯说：“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以劳动交换劳动”——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話，那么，它就是說，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之可以相互交换。”^③（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种“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的互相交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说的等价交换。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交换，必须通过物的形态，或者说必须以物为媒介来进行。把这种不言而喻的事情，說成是商品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不仅有“見物不見人”（商品交换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嫌疑，而且也未免有点小题大作了。

第三，是社会主义分配领域中的劳动交换。胡钧同志所说的直接的劳动交换，就是指此而言的。他认为“这里的劳动交换不会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劳动交换”。其实，从分配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劳动交换，归根结底，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而不会是活劳动的直接交换。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在物的形态上所进行的

劳动交换，究竟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呢，还是通过产品的直接分配来实现呢，那要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条件来决定。但无论如何，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劳动交换终究是要通过物来实现的。马克思曾认为有两种分配：一种是生产产品的分配，即消费品的分配；另一种是生产要素的分配，这种分配是包括在生产之中的。^④恩格斯说：“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被分配的产品数量”。^⑤可见分配就是劳动产品的分配，而工人们所首先取得的货币工资，不过是社会劳动产品的一般等价物而已。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还存在着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劳动已经不是私人劳动，而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但这种直接的社会劳动还必须利用价值和价值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即还要经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不能认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就必须进行直接的劳动交换。胡钧同志预先断定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劳动交换是不等量的，所以才說等量的劳动交换不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必须是直接的劳动交换。其实，劳动的等量交换和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劳动交换，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劳动的等量交换是内容，在物的形态上进行交换是形式，内容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1页。
-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4年版，第67页。
-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
- ④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页。
- ⑤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87页。



和形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統一的。

总括以上所說，可見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以外，無論在交换領域中或在分配領域中，生产者之間的劳动交换都必須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即都必須通过产品来实现。

胡鈞同志的全部論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面的：商品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直接的劳动交换（即分配）則是不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的。既然这个前提本身成了問題，那么胡鈞同志的全部論断也就失掉基础了。胡鈞同志认为等量劳动交换与不等量劳动交换的“分界綫”就在于一个“物”字（“有物”或“无物”），但事实上这两种交换都是同“物”分不开的，于是胡鈞同志的“分界綫”也就被突破了。

二、关于商品的等价交换問題

現在我們再进一步地考察一下胡鈞同志对于商品交换問題的看法。

胡鈞同志說：“通过物的形态进行劳动的交换，交换双方所关心的就必然只能是生产物之間的比例关系，等量的同种物品就被看作是相同的等量的劳动。不管实际劳动耗費怎样，等量等質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場上換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这是商品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內耗費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影响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生产資料的优劣所帶給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同等熟練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劳动者，会因技术

装备的好坏而花費不同量的劳动，因而在每件产品上就实际上凝結着不同量的劳动。”这就是說，由于生产資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量同类商品包含着不等量的劳动，而在市場上却实行等价交换，因而这只是形式上的等价，而實質上却是不等价的。簡言之，真正的等价交换——即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的交换，或以商品价值为基础而进行的等价交换——實質上是并不存在的。

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的交换必須以它們的价值（即社会价值）为基础来进行，而商品的价值則是由它們在生产中所耗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以劳动時間計算）来决定的。因此，商品的等价交换，實質上也就是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簡言之，就是劳动的等量交换。我們前面引証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一句話：“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之可以相互交换”，就是指此而言的。

在这里，有两个問題往往会引起对于等价交换的怀疑，需要加以說明：

（一）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背离同等价交换的关系問題。商品交换毕竟是通过商品价格之間的比例关系来进行的。但参加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在以价值为基础的条件下，却又可能与它們的价值发生某些背离。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計划价格來說，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例如甲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社会价值，乙商品的价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这两种互相交换的商品由于它們的价格与价值依相反的方向发生背离，所以好像不是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我們能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价格与价值发生某些背离，就认为商品的等价交换原来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呢？当然不能。第一，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以它们的价值为基础而进行的交换。尽管某些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一定的背离，但这种与价值相背离的价格，仍然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按照这种价格进行的交换，仍然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对于商品交换的一般的要求，并不是說在任何情况下，两种互相交换的商品都必须分毫不差地各自按照它们的价值来进行交换。等价交换，同其他許多社会现象一样，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二，等价交换是就整个的商品“界”来說的，这并不排斥个别的商品在交换中发生不完全等价的情形。但整个說来，这种情形是可以互相抵銷的。某几种商品互相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交换的情形，不但是常常换位，而且是相剋相消的。結果，还是归結为一个总的等价交换。价格与价值背离，是等价交换过程中的偏差；等价交换，又会使这些偏差互相抵銷。背离是局部的现象，等价交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們不能因为看到局部的现象，就否认了客观规律。

(二) 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背离同等价交换的关系問題。馬克思說：“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那就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由各个場合生产家实际費去的劳动时间来計量，而只由該商品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計量。”^① 所以，商品的等价交换是指商品按照其社会价值(或以社会价值为基础)所进行的交换，或者說，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等量交换，而并不是指商品按照其个别价值所

进行的等价交换或个别劳动的等量交换。可是，因为“一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現在其內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例，与实現在其內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②，所以，由于各个生产单位的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商品的个别价值(由个别劳动消耗量所决定的价值)也就有的高于其社会价值，有的低于其社会价值。但商品交换总是以其社会价值为基础来进行的。于是劳动生产率較高的企业就能够在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上出售，从而获得一个額外收入；反之，劳动生产率較低的企业，就得在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下出售，从而就有一部分价值(超过社会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个别价值)不能实现。然而上述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商品的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正是以商品的社会价值为准繩，来矯正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背离；也就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为准繩，来矯正商品生产中的个别劳动消耗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背离。等价交换，正如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一样，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就整个商品“界”来說的，并不是专就某些个别的商品来說的。

在上述这两种背离中(即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和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背离)，胡鈞同志正是抓住了后一种背离，来否认商品交换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的交换，而否认这一点，實質上也就是否认了商品的等价交换。为什么胡鈞同志会有这样一种見解呢？这就是因为他把等价交换看成是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378頁。

② 同上書，第13頁。



商品按照其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消耗)所进行的等价交换,而不是按照其社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所进行的等价交换,并且把等价交换看得绝对化了。

现在我想和胡鈞同志商討一下:商品按照其不同的个别价值所进行的等价交换(如果有的話),實質上是不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呢?

馬克思在談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結晶于这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时候,曾举例說:“在英国,当汽力織机已开始来和手織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紗轉化为一碼布或一碼呢子,只需要使用原先劳动時間中的半数時間。誠然,可怜的手織机織工,現在已不是如从前那样每天劳作九小时或十小时,而是每天要劳作十七至十八小时了。但是,現在这織工二十小时劳动的生产品中只包括有十小时社会劳动,或十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时所必須耗費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这个織工現在二十小时劳动的生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多于他从前十小时劳动的生产品中所包含的价值。”^①根据上面这段話,我們可以分析两种情况:

(1) 現在紡織工业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显然是由使用机器的織工們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机器織工的个别劳动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如果用手織机織工二十小时的个别劳动(等于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机器織工二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交换是通过貨幣来进行的),那實質上就是用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二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20=20”,而實質上却是“10≠20”。所

以,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但實質上却是不等量的劳动交换,也就是非等价交换。

(2) 反之,如果現在用手織机織工二十小时的个别劳动(等于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机器織工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那實質上就是用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20=10”,而實質上却是“10=10”。所以,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不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即非等价交换;但實質上却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即等价交换。

由此可見,所謂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是指社会必要劳动來說的,并非指个别劳动來說的。手織机織工用二十小时的劳动去交换机器織工十小时的劳动,从現象上看,好像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但从本質上看,却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也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在这里,現象和本質是不一致的。胡鈞同志大約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否认商品的等价交换是等量的劳动交换。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个别的劳动消耗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矛盾的社会的等价交换与个别的不等价交换的矛盾,是推动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消耗的动力之一。既然商品交换是按照社会的等价进行的,因而个别企业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如果高于其社会价值,它們个别的劳动消耗

①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4年版,第399頁。



如果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那么，它們在交換中，就会补偿不了它們的劳动消耗（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它們就会在等价交換的行列中“掉队”。而且，等价交換中的“等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某个企业的产品的个别价值符合于其社会价值，但明天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同类产品的社会价值降低了，如果这个企业还是故步自封的話，那么它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就要高于其社会价值，于是就要在等价交換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有以上这些情况，可以促使我們的社会主义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使落后的企业赶快摆脱落后状态，使先进的企业继续前进。可見等价交換对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反之，如果我們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去进行“等价”交換，按照个别的劳动消耗去进行“等量的”劳动交換，那倒可以使落后的企业高枕无忧，安于现状。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有害的。

三、关于按劳分配問題

胡鈞同志除了对于等价交換問題有某些誤解以外，对于按劳分配問題的某些看法也是可以商討的。

胡鈞同志說：“在这里工人所領得的貨幣，并不是与他的劳动所創造的价值直接相联系的。从經濟关系上來說，它不是工人所創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領域內，貨幣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工人所創造的价值的。下列事实可以說明：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虽然由于設

备好坏的不同，会制造不同量的产品，从而創造不等量的社会价值，可是他們却得到同量的貨幣工資。在这里，同量的貨幣絲毫也說明不了工人創造的社会价值是多少和是否相等。这明显地表明：在这个关系中，貨幣并不是工人劳动所創造的价值量的証明，而只是劳动者貢獻給社会的一定的劳动量的証明。由此可見，把职工用工資去購買消費品，說或是职工与国家的等价交換关系也是不恰當的。……这里同量的貨幣并不代表等量的价值，但它却能購買等量的消費品。”

为了便于討論起見，首先应当明确：这里胡鈞同志所說的“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是指社会必要劳动來說的，而工人們“得到同量的貨幣工資”，就是这一点的証明。甲汽車厂与乙汽車厂的七級工，虽然两个工厂的設備好坏有所不同，但却都是被社会所承認的同一級的熟練工人。这和我們前面所引証的机器織工与手織机織工的差別，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胡鈞同志在上述那段話中首先提出來一個問題：既然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在同一時間內會創造“不等量的”价值，但却可以得到同量的貨幣工資，這算不算是“按劳分配”呢？如果說按劳分配并不反映工人們所創造的价值，那它还有什么物質基础呢？

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說，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尽管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時間內創造不同数量的使用价值，但却創造同量的价值。馬克思写道：“生产力無論怎样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時間內，总是产生等量的价值。但它在同一時間內却会产生不等量的使用价值，当生产力上升时就会更多些，当生



产力下降时就会更少些。同一的生产力变化，一方面固然可以增加劳动果实，从而可以增加由这个劳动所产生的使用价值量，但同时却又可以减少这个增加了的使用价值的总价值量，假如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会缩短了这些使用价值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全部劳动时间的話；反过来，也就相反。”^① 根据这个原理，两个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但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在同一時間內，却創造等量的价值。因此，这些工人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則获得同量的货币工資，是与他們各自所創造的价值量相适应的（相适应并非相等）；也只有与工人們所創造的价值量相适应的消費基金的分配，才能說得上是按劳分配。

假定有两个使用“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的企业，但劳动生产率不同。在这里，劳动生产率較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同一時間內創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实现了更多的价值。这个多实现的价值来源，是由社会上其他企业的劳动者所創造而由它所占有的——当然，归根結底，还是归全民所有。反之，劳动生产率較低的企业工人，在同一時間虽然也創造了同量的价值，但却有一部分不能由它自己来实现。所以，在同一時間內創造同量价值的这两个企业的同样的工人，获得同样的基本工資（奖金除外），这正是体现了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換的原則，即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則。反之，如果两个企业的同样工人創造同量的价值而获得不同的工資，或如胡鈞同志所說的創造不同量的价值而获得同量的工資，那倒是違反

按劳分配的原則了。胡鈞同志否认按劳分配是以工人們所創造的价值为基础的，那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按劳分配本身。如果說按劳分配并不是以工人們的劳动成果（他們所創造的价值）为根据，那它岂不是成为架空的东西了嗎？

在这里，胡鈞同志大約是忽略了一些不同的范畴的区别：

第一，他对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注意得不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尽管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時間內所創造的价值量是相同的，但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却有所不同。当使用价值量增加时，每件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相应地减少了；反之，当使用价值量减少时，每件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相应地增加了。我們不应当把使用价值量的增减看成是价值量的增减。（不过，应当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最少量的劳动消耗取得大量的使用价值，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第二，他对于劳动創造价值与劳动轉移价值的区别，注意得不够。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時間內，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尽管所創造的新价值是相等的，但所轉移的旧价值、即生产資料的价值，却有所不同。劳动生产率高，所轉移的旧价值就多些；劳动生产率低，所轉移的旧价值就少些，不可以把二者混为一談。

正因为胡鈞同志忽略了以上这些区别，所以他才认为：“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虽然由于設備好坏的不同，会制造不同量的产品，从而創造不等量的社会价值，可是他們却得

^① 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0頁。此處譯文，引者根据恩格斯所編的英譯本第53—54頁，略加更動。



到同量的貨幣工資。”我認為应当這樣說：同質同量的同種勞動，雖然由於勞動生產率不同，在同一的時間內會生產不同量的使用價值，但卻創造同量的價值，所以他們才獲得同量的貨幣工資。只有這樣，按勞分配才有現實的基礎。

除了上述這個基本問題以外，胡鈞同志對於貨幣工資的理解，也是值得商討的。他認為：作為職工工資的貨幣，“並不是作為一般等價物來衡量工人所創造的價值的”，“同量的貨幣並不代表等量的價值”，所以，貨幣“只是勞動者貢獻給社會的一定的勞動量的證明。”總之，胡鈞同志認為按勞分配之“勞”，並不反映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因而作為工資的貨幣也就不是一般等價物，而只是勞動量的“證明”。

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作為職工工資的貨幣，同其他貨幣一樣，都是一般等價物，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儲蓄手段、支付手段等各種職能。當我國國營企業的職工們，通過分配的途徑，獲得貨幣工資的時候，從國家來說，這種貨幣盡了支付手段的職能；從職工來說，則取得了一般等價物，它代表價值、代表抽象勞動。

胡鈞同志一再說，作為工資的貨幣只是一種“證明”或“證券”。其實，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存在的條件下，貨幣本身也是一種“證明”或“證券”，列寧就曾把貨幣稱為“有權取得社會財富的證券”^①。只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已經不存在了，當貨幣已經消亡了的時候，才會出現真正的勞動“證明”或勞動“證券”，這種“證券”像戲院的門票一樣，是不流通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說：

勞動者“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收據，證明他供給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收據又從社會儲備中領得與其勞動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費品。他以一種形態給與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態全部取回來。”^②我們應當怎樣去理解馬克思的這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話呢？我認為，當商品、貨幣已經不存在的時候，這張“收據”就是真正的勞動券，而用這張“收據”去領取消費品的過程，就是直接的產品分配過程；反之，當商品、貨幣還存在的時候，這張“收據”就仍然是貨幣，而用這張“收據”去“領取”消費品的過程，也就是商品交換的過程（直接分配的那部分產品除外）。

胡鈞同志否認國營企業職工所獲得的貨幣工資是真正的貨幣，固然是為了否認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存在着商品關係，但這對於按勞分配也是一種誤解。如果說“貨幣並不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量的證明”，那麼，用什麼去表現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呢？如果說工人獲得多少貨幣工資，並不反映他們所創造的價值量，那麼，憑什麼去給張三這些工資、給李四那些工資呢？這樣一來，按勞分配豈不成為虛無飄渺的東西了嗎？

此外，胡鈞同志對於按勞分配反映什麼關係問題的看法，也是值得研究的。他說：“……就消費基金本身的分配來說，表面看來是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實際上它首先直接是國營企業全體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勞動

① “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21頁。



者彼此之間的劳动交换关系。”这种看法也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国营企业职工关于消费基金的分配，既表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表现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統一的，因为国家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不仅要决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一点，胡鈞同志是承認的），不仅要從全部社会产品中扣除馬克思所說的社会保險基金；而且还要从剩下的全部消费基金中扣除如同馬克思所說的“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費用”、“作为共同滿足需要的費用”，以及“为丧失劳动力者設立的基金”等。不仅如此，就是在个人分配的过程中，怎样分配、采用什么形式分配等等，也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列宁曾經指出，在国营企业中，全体工作者都受雇于国家。但是雇佣形式在这里所表現的不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关系，不是資本家購買无产者的劳动力，而是各个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之間的关系。”^①（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既然如此，又怎能认为消费基金的分配只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呢？承认消费基金的分配包括双重关系：既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間的关系，又包括个人与国家之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在分配問題上，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間的矛盾，又要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間的矛盾。只有这样，才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利。

四、关于交换与分配的关系問題

交换和分配都决定于生产，首先是决定

于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形式。馬克思說：“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間的一定的关系。……在不同諸要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凡是有机的整体总是这种情况。”^②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們既不能把交换和分配互相混淆起来，例如用分配去代替交换；也不应当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交换与分配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而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存在的条件下，分配更不能离开交换而孤立地存在，在大多数的場合，消费基金的分配是借助于交换而最后实现的。

我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討論胡鈞同志对于交换与分配的关系問題的意見：

（一）胡鈞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交换和分配混淆起来了。例如他說：“假如說，职工向国家購買消费品是国家与个人間的商品交换关系，那就是說双方是等价交换。可是，假若工人所創造的价值与国家供应給他的消费品所包含的价值真的是相等的話，那就是說，他取回了他貢獻給社会的劳动的全部。但是，这样就成了拉薩尔式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領回的只能是在扣除为社会基金劳动的部分后的劳动部分。工人只是以这部分劳动，到社会上領取与这个劳动量相当的那么多消费品。可是这样一来，工人貢獻給社会的与他所換回的就不能說是等价的。所以，这里根本談不到是等价关系。”

① 苏联“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 1959 年修訂第三版，第 526 頁。

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2 頁。



在上述這段話中，實際上包含着兩個問題：一個是消費基金的分配問題；一個是商品的等价交換問題。所謂“工人領回的只能是在扣除為社會基金勞動的部分後的勞動部分”，這是指分配來說的。通過分配，工人們取得了貨幣工資、即取得了一般等价物。這個過程用公式來表示，就是：“勞動（為自己勞動部分）……貨幣（貨幣工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因為勞動力不是商品，所以在分配過程中當然也就不存在着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等价關係”；工人們也並不是把他們的全部勞動成果都取回去，而只是取回為自己勞動的部分。分配的結果，工人們取得了作為一般等价物的貨幣。但貨幣本身並不能直接消費，還必須由貨幣向消費品轉化。於是繼分配之後，又開始了第二個過程，即交換過程。胡鈞同志所說的“工人只是以這部分勞動，到社會上領取與這個勞動量相當的那么多消費品”，其實，就是指此而言的。只有經過交換，工人們才能取得消費品（直接供給的部分除外，如果有的話），用以去滿足自己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所以交換過程乃是分配過程的補充和繼續，它是分配與消費之間的橋樑。它的公式是：“貨幣——商品”，即真正的等价交換。總之，工人們從領取貨幣工資起，到取得消費品止，要經過兩個既有區別、又互相銜接着的過程。

(1) 分配過程：“勞動（為自己勞動部分）……貨幣（貨幣工資）”。

(2) 交換過程：“貨幣——商品”。

胡鈞同志把這兩個過程攪在一起了，用一個去咬另一個，遂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這裡根本談不到是等价關係”——這本來是

指分配來說的，但一翻手之間，他卻又把這種非等价關係轉嫁到交換的頭上，並由此否定了交換的存在。

(二) 胡鈞同志在某些地方又把交換與分配截然分開，甚至對立起來了：

第一，他認為商品交換是通過“物”來實現的非等量的勞動交換，而分配則不是在物的形態上進行的等量的勞動交換（這裡所說的勞動，是指活勞動或流動狀態的勞動）。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無論是商品交換或消費基金的分配，都不能離開“物”，因此，以“有物”或“無物”為標準把兩者截然分開，那是沒有根據的。至於說分配是等量的勞動交換，交換則不是等量的勞動交換，如前所述，這也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說：“說到消費品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裡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換里也通行的那個原則，即一種形態的一定數量的勞動可以與另一種形態的同量勞動交換。”^①可見兩者都是一種形態的一定數量的勞動與另一種形態的“同量勞動交換”，即都是等量的勞動交換。那麼，既然兩者都是等量的勞動交換，是不是還有區別呢？區別當然是有的：在分配領域中的等量勞動交換，是指在作了各種必要的扣除以後（這裡包含着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勞動者相互之間的等量勞動交換；而在交換領域中的等量的勞動交換，則主要是勞動者以他們在分配領域中所取得的一般等价物（貨幣）與掌握在國家手裡的消費品的等价交換，這裡主要是表現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儘管有這樣的區別，但我們卻不能把這

①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21頁。



两种等量的劳动交换互相对立起来。

第二，胡鈞同志說：“真正商品关系存在的地方，参加商品交换的人们的收入，是由交换的结果决定的。劳动的质量只能由交换来评价。但是，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收入水平却与商品交换本身没有联系。……他们的收入只是根据他们的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支出的劳动数量等决定，而根本脱离商品交换那种‘等价原则’所引起的后果。”这就是說，消費基金的分配与商品交换是没有关系的。的确，国营企业中职工的固定工资额，是不受商品交换条件（包括价格的漲落）的直接影响的。但这决不等于說交换与分配就没有关系了。商品价格的漲落虽然不直接影响职工的工资额，但却影响他们的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也就是影响他们的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职工实际工资的增长，除了扩大社会福利事业以外，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其一，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货币工资额；其二，是在货币工资额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水平；其三，是上述两者兼而有之。用降低物价的办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增加职工的实际工资（以及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即使說这是国家預定要增加分配給职工的消費基金，但毕竟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又怎能說交换对于分配没有影响呢？在商品和货币还存在的条件下，消費基金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最后实现的。宁可以說，貫徹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实现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条件。等价交换同按劳分配是血肉相連的。反过來說，分配对于交换也是有影响的。职工人数的增加和他們的货币收入的增加，直

接影响到商品市場的供需状况。一九五八年我国在大跃进中，某些消費品之所以曾經一度发生供不应求的現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职工人数的大量增加和他們購買力的迅速提高。这不是分配影响交换的証明嗎？馬克思写道：“我們所得的結論，并非說生产、分配、交换、消費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說，它們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統一体的不同的方面。”^①既然分配和交换是一个总体的两个环节，又怎能互不相关呢？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鈞同志认为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这二者是两种本質不同的經濟关系，因而不能同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在存在实質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貫徹按劳分配原则的，就統一的社会范围内，即就通过商品形式交换自己产品的双方的关系来看（不是就每个集体所有制經濟内部來說），是与按劳分配原则不一致的。……真正的商品的等价交换却并不总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貫徹的。”为什么商品的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竟如此互相排斥、以致不能同时并存呢？这是因为“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商品关系所反映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的劳动的相互交换，即等价交换。二者的本質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等量劳动’中是否包含生产資料的优劣所帶給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明白地說，就是由于生产資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致商品的等价交换并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只

① 參看“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1頁。引者根据N·I·Stone的英譯本，將譯文略有改动。



有按劳分配中的直接的劳动交换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所以据胡鈞同志看来,凡是存在着非等量劳动交换的地方,就扰乱了或影响了等量的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之所以不能同时并存,乃是由于等量的劳动交换与非等量的劳动交换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

所謂商品交换“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以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交换“不是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的”,等等,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过了。而既然所有这些站不住脚,于是胡鈞同志上述論断的理論根据,也就发生問題了。

而且,如果說在存在着商品等价交换的地方,就不能完全貫徹按劳分配的原則,那么,在我国目前广泛地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岂不是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東西了嗎?照此推論下去,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要按劳分配,那就得拋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者我們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就得拋棄按劳分配。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來說,“魚”和“熊掌”我們都要,何況二者并非不可得兼,而是相得益彰的。在目前我国的条件下,既然按劳分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来实现

的,假如我們拋棄了商品交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并不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則的貫徹,而是使按劳分配失去了凭借。

不仅如此。如果由于生产資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存在實質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貫徹按劳分配原則的”,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間,因为广泛地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于是双方也就都不能貫徹按劳分配的原則了: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因为生产資料較优,在交换中占了便宜,所以在分配中除了按“劳”以外,还加上一个按“資”(生产資料);反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則因为生产資料較劣,在交换中吃了亏,所以按劳分配也就打了折扣。当然,胡鈞同志并没有这样說,也可能沒有这种想法;但人家如果按照邏輯推論下去,那可怎么办呢?

总之,我认为把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两者是相輔相成的。

以上这些意見很不成熟,也可能对于胡鈞同志的文章有誤解的地方,請胡鈞同志和其他同志多加指教。

編 者 的 話

有关經濟理論方面的問題,本刊已陸續刊載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有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問題,进行了不同意見的討論。本刊收到不少参加这个問題的討論的文章,但是由于篇幅所限,这些文章多数沒有能够发表,謹向作者致以歉意。我們希望今后討論的範圍和問題更加广泛,除了繼續討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問題以外,还討論国民經济各部門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問題,綜合平衡和速度的問題,以及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的其他重大的实际問題和理論問題。

